

#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盛 斌 郝碧榕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市场结构视角,借助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企业相对规模扩大会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其次,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再次,通过比较中国大企业的应有规模和实际规模,发现差别化政策的存在致使部分大企业的实际规模大于其应有规模,出现资源误置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无谓损失;最后,基于 Shapley 方法分解的结果显示,企业相对规模与行业市场集中度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和有偏技术进步因素,且明显大于其他因素。研究结论为理解市场结构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理论证据,也将有助于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劳动收入份额;加成率;差别化政策;Shapley 分解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21)01-0001-14

DOI:10.13269/j.cnki.ier.2021.01.001

## 一、引言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过去的二十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态势<sup>[1-2]</sup>。长期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包括抑制人力资本投资、加剧社会不平等、削弱社会消费能力等<sup>[1-3]</sup>。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sup>①</sup>。在此背景下,探讨实现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成因,众多学者认可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sup>[4-5]</sup>;在微观层面,有偏技术进步被认为是决定要素收入份额水平的关键因素<sup>[6-8]</sup>;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会导致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sup>[1]</sup>;此外,考虑到市场的非竞争性,部分文献也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即认为垄断利润是导致要素收入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sup>[6]</sup>;国际贸易与全球化通过以上三种因素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sup>[9-10]</sup>。

值得注意的是,与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同时出现的另一重要现象是我国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从2001年的11家迅速增长到2020年的133家(含港澳台),这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20-10-12;修回日期:2020-12-16

**作者简介:**盛斌(1971—)男,天津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郝碧榕(1993—)女,山西长治人,通讯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JJD790003);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

但是,在部分企业大规模崛起的过程中,行业中的“马太效应”和“赢者通吃”现象也同步显现,市场逐步向头部集中。那么这种企业规模及其分布变化引起的市场结构变动,除了会造成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否可能也会影响到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与已有文献中关于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探讨最为相关。这类文献按照研究结论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市场中竞争程度的加强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类文献按照其研究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分析:(1)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分析中,白重恩等<sup>[11]</sup>通过构建模型求解要素分配份额,并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得出了垄断能力越强的企业,要素收入分配更偏向资本而不是劳动的结论。申广军等<sup>[12]</sup>使用企业加成率衡量企业的市场力量,发现市场力量越强的企业利润份额越高,从而劳动收入份额越低。(2)基于行业层面的较早分析中,Blanchard and Giavazzi<sup>[13]</sup>认为产品市场垄断程度降低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Barkai<sup>[14]</sup>发现竞争缺乏导致了资本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双双下降。与其思想一致,Autor *et al.*<sup>[15]</sup>研究表明美国超级大企业拥有的市场力量成为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尽管存在研究层次的差异,但以上文献的观点存在相似之处,即认为市场中的垄断力量使得资本或利润份额得到提升,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第二类研究则认为,市场竞争的加强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例如文雁兵和陆雪琴<sup>[16]</sup>研究表明市场竞争效应通过促进资本深化和技术偏向,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贾坤和申广军<sup>[17]</sup>研究表明垄断程度强的行业劳动收入份额较高。以上两类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所以进一步研究、明确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征程的新时代背景下,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重要议题。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在中国大企业发展过程中,市场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如何平衡“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解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市场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还能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启示。有鉴于此,本文将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中,并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经验检验。

在已有文献提供重要借鉴的基础上,本文可能在以下三点推动了现有文献的发展:(1)已有文献大多是单一针对企业或行业层面的市场结构特征,考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本文将企业自身的市场特征与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同时考虑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相对规模,也取决于其所属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一步强调了优化市场环境的重要性。(2)本文针对中国特殊存在的“差别化”政策,纳入资源错配的概念,比对中国大企业的实际规模和应有规模,对回答如何促进中国大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3)不同于大多基于单一要素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本文基于Shapley分解法,进一步比较了多种因素对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度,其排序结果为进一步理解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来源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事实分析;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数据;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扩展性分析,实证检验影响机制并探讨“差别化”政策对企业规模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第六部分基于Shapley分解法比较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贡献度;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 二、理论分析与事实分析

### (一) 理论分析

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企业支付给劳动要素的收益占总增加值(所有要素收益)的比重。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恰好可以把支付给劳动要素的工资成本转化成产品的销售价格,劳动收入份额

即为劳动产出弹性<sup>②</sup>；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可以将工资转化为更高的价格，从而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这一将工资转化为价格的能力反映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可以用产品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度即成本加成（markup）度量——成本加成率越高，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强；成本加成率越低，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弱。据此，可以认为企业的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以下将从企业与行业层面分析，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如何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和劳动收入份额。

### 1. 企业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企业规模是企业异质性的来源。企业规模的扩大主要来源于内生因素的改变，包括企业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管理效率提升等<sup>[18]</sup>，当然，部分外生因素的变化也会引起企业规模的变化，例如地区保护政策、补贴政策等也会促使企业扩大规模，结果表现为生产总值或销售额的增加。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企业内生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企业降低平均成本，进而提高产品价格与成本的比值，带来成本加成率的提高<sup>[19]</sup>；另一方面，在行业中其他企业销售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特定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即相对规模的扩大，也反映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以及市场中谈判能力的增强<sup>[20]</sup>，促使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价格决定能力，更容易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成本以更高的加成系数转化为销售价格。在以上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企业会将获得的额外收入作为利润保留，劳动只能分成所获收益的小部分，因此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结果<sup>[12]</sup>。由此，提出本文的待检验假说：

假说 1：企业规模扩大会通过降低企业边际成本以及提高市场谈判力，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 2. 行业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成本加成的产生是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结果，因此企业的生存环境及其导致的差异化市场都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sup>[21]</sup>。市场结构描述了相互竞争企业之间的规模分布，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市场竞争与垄断关系的概念<sup>[22]</sup>。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会促使少数大企业构筑进入壁垒以限制竞争，这会同时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影响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品市场中，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程度低，可以凭借较高的产品价格获得垄断租金；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对于工资和垄断租金的讨价还价能力还比较低，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决定，与企业利润关系不是很大。因此，垄断程度越高的行业中，作为雇主的企业越容易处于支配地位，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越弱<sup>[6, 11]</sup>。在这种联合市场结构下，企业大部分的垄断租金转化为企业利润，从而造成了劳动报酬对劳动贡献的偏离<sup>[23]</sup>。这些结果表明，在市场集中度较高也就是垄断程度较高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在产品市场与劳动要素市场中的势力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由此，提出本文的待检验假说：

假说 2：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竞争程度较低，劳动力议价能力较弱，导致企业获得较高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 3. “差别化”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依照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大企业以及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较低的，但是“大”和市场集中是否一定是不值得提倡的？在提出假说 1 的分析中，本文认为企业的大规模一方面来源于内生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受到外生政策的影响。本部分将讨论在中国制造业的大企业中，是否由于外生政策的影响，促使企业拥有与其生产率并不匹配的大规模。

从理论上分析，市场中不存在差别化政策或其他资源误置时，企业的最优规模由生产率内生决定，与生产率存在一一对应的单调关系<sup>③</sup>。而事实上，由于竞争缺乏、补贴等政策的存在，中国大企业可能出现了生产率与实际规模不一致的现象。例如，一些大企业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sup>[25]</sup>，而民营和高效率的企业则难以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出现了经济扭曲导

致的企业生产规模分布和生产效率分布的不一致<sup>[26]</sup>。进一步地,额外的市场势力也会带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由此,提出本文的待检验假说:

假说3:由于“差别化”政策的存在,中国部分大企业的实际规模与生产率水平并不一致,高于生产率水平的规模部分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市场势力,这部分额外的势力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合理下降。

(二) 典型事实分析

图1绘制了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均值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出1998—2007年间,行业市场集中度以及企业平均规模呈递增的趋势,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递减态势。

为进一步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将企业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在行业层面取均值后,绘制了初步关系图。可以看出企业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分析的预期是一致的。接着,图3绘制了行业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均值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也呈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的行业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越低。

此外,为了观察是否存在“差别化”政策导致企业实际规模与应有规模之间存在差异,图4绘制了行业内生产率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实际规模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可以看出,两类样本并不重合,且生产率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实际规模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可以间接表明,实际规模较大的企业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其大规模可能是受到了“差别化”政策等外生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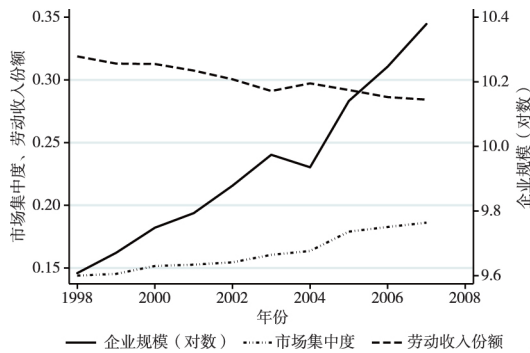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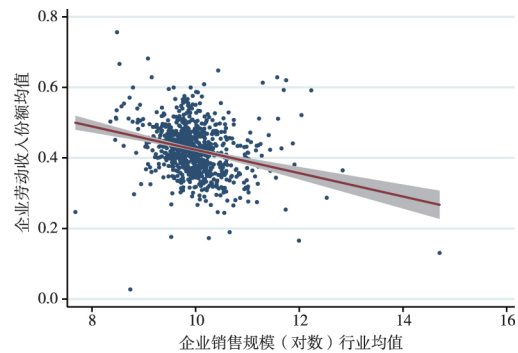


图2 企业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初步观察  
注:图中的阴影表示95%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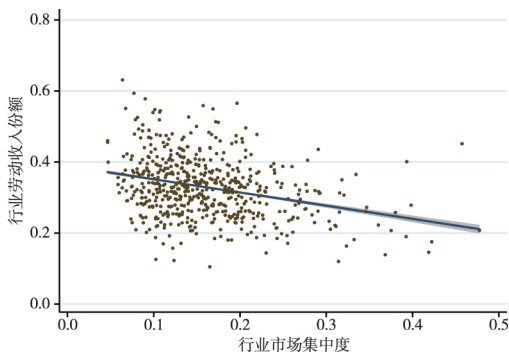


图3 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初步观察  
注:图中的阴影表示95%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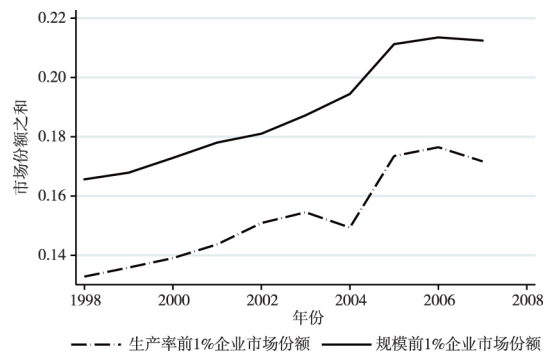


图4 生产率前1%企业和实际规模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1998—2007年

###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 (一) 计量模型

本文关注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aborshare_{it} = \alpha_1 + \beta_1 size_{it} + \beta_2 concen_{jt} + \gamma_1 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企业,  $j$  表示行业,  $t$  表示时间。 $laborshare_{it}$  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size_{it}$  为企业的相对规模,用企业销售额在所属四分位行业中的市场份额表示;  $concen_{jt}$  为企业  $i$  所属行业  $j$  在  $t$  年的市场集中度,  $X_{it}$  为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利润率、企业融资约束、企业年龄、资本劳动价格比等变量,  $\mu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mu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 (二) 指标测度

##### 1. 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的测算

衡量企业规模的变量通常有三个:销售额、资产和员工人数。由于销售额对生产要素的比例是中性的<sup>[27]</sup>,本文使用企业销售额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相对于企业的绝对规模,其相对规模更能反映出企业的市场力量,与本文的主题更为契合,所以这里采用企业销售额占所在四分位行业总销售额的比重( $size$ )衡量企业的相对规模;此外,本文关注行业中大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采用了市场集中度( $concen$ )作为衡量指标。具体来说,使用行业内销售额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 $CR1per$ )衡量其市场集中度,该比重越大意味着该行业的销售额越集中地来源于行业内的少数大企业。同理,本文也采用了行业内销售额前10%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 $CR10per$ )作为市场集中度的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sup>④</sup>。指标测算用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2. 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劳动收入份额( $laborshare$ )是指劳动报酬占全部要素报酬的比重,在企业层面可用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表达。根据增加值测算方法的不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包括收入法和生产法两种,具体而言:与申广军等<sup>[12]</sup>一致,收入法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 = (工资 + 福利费) / (工资 + 福利费 + 折旧 + 营业盈余 + 生产税净额);与盛斌和毛其淋<sup>[28]</sup>计算增加值的方法一致,生产法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 = (工资 + 福利费) / (总产值 - 中间投入合计 + 应付增值税)。两种方法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3. 其他控制变量

除核心变量外,在回归方程(1)中,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企业资本密集度( $lnkl$ ),为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从业人数的比值。企业资本密集度衡量了企业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所以资本密集度的预期符号为负;企业利润率( $profit$ ),采用利润总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率来衡量<sup>[29]</sup>。企业利润率衡量了企业分配收益时利润的比重,利润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因此利润率的预期符号也为负;资本劳动价格比( $kl\_price$ ),用中国人民银行年初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与当地最低工资的比值表示。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越高,企业在选择生产要素时会更偏向劳动,从而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因此资本劳动价格比的预期符号为正;企业进口( $ln\_im$ ),采用企业进口额加1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进口会通过进口中间品替代劳动效应、促竞争效应等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预期符号不确定;企业出口( $ln\_exp$ ),采用企业出口额加1的对数值来衡量。长期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拉动国内就业,可能会因此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这里预期企业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ln\_inno$ ),采用企业新产品销售额加1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创新。企业创新是利用既有的知识和物质通过改进或者创造新鲜事物的活动,这一提高生产率<sup>[30]</sup>的过程可能对资本要素或者劳动要素具有偏向性而非中性,预期符号不确定;融资约束( $fin$ ),

为利息支出占固定资产的比重。罗长远和陈琳<sup>[31]</sup>研究认为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会通过利润留成应对融资困难,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因此融资约束的预期符号为负;此外本文还加入了企业层面的其他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现年份-企业开工年份+1;国有资本占比(*soe\_ratio*),采用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的占比来表示;外商资本占比(*for\_ratio*),采用实收资本中外国资本的占比来表示。

###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调查对象包括了全部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在使用数据时,本文借鉴 Brandt *et al.*<sup>[32]</sup>的做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处理:剔除总产值、销售额、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固定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等缺失、为负值或零值的制造业样本;剔除雇佣员工人数低于8人的企业;剔除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的企业以及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的企业;除此之外,本文还剔除了应付工资总额与应付福利费之和为零的企业,并进行价格指数平减。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更新到2013年,但由于以下原因的存在,本文的主要回归及描述性分析中只采用1998—2007年样本:第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口径从2011年之前的规模大于500万的工业企业,变为为了2011年及之后规模大于2000万的工业企业,若将两个区间内的样本混合进行分析,会产生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也会对2011年及之后的行业市场集中度产生高估,导致对本文核心结论估计的偏误;第二,工业企业数据库未提供2008—2010年间的应付职工薪酬变量,无法计算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综上所述,本文的计量分析及描述性分析中主要采用1998—2007年样本,将2011—2013年样本单独用于稳健性分析。表1描述了本文核心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收入法)	1 156 840	0.418 86	0.220 94	0.000 10	0.999 87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生产法)	1 156 840	0.290 96	0.215 38	0.000 02	1
企业销售份额	1 156 840	0.002 10	0.007 44	0.000 00	0.535 83
行业前1%企业销售份额	1 156 840	0.195 46	0.095 87	0.030 46	0.630 04
行业前10%企业销售份额	1 156 840	0.555 57	0.099 28	0.269 46	0.963 75
企业年龄	1 156 840	10.875 96	10.120 09	1	59
资本密集度	1 156 840	3.571 74	1.316 33	-6.969 79	13.026 56
企业进口	1 156 840	1.379 07	4.034 68	0	23.053 89
企业出口	1 156 840	2.024 48	4.932 59	0	23.634 46
融资约束	1 156 840	0.070 63	1.939 18	-238	1 056
利润率	1 156 840	0.047 19	0.719 62	-0.987 54	767.535 70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	1 156 840	0.025 56	0.012 59	0.010 96	0.100 42
企业创新	1 156 840	0.769 83	2.616 89	0	18.515 99
国有资本比重	1 156 840	0.085 71	0.266 81	0	1
外商资本比重	1 156 840	0.063 70	0.223 42	0	1

计的偏误;第二,工业企业数据库未提供2008—2010年间的应付职工薪酬变量,无法计算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综上所述,本文的计量分析及描述性分析中主要采用1998—2007年样本,将2011—2013年样本单独用于稳健性分析。表1描述了本文核心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统计特征。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方程(1)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所有的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为收入法计算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市场份额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销售份额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与理论分析一致,这是因为企业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成本节约效应以及市场谈判能力增强提升了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获得了劳动力成本之外更高的超额利润,从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此外,用销售额前1%企业市场份额之和表示的市场集中度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取决于其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越高的行业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在第(4)列至第(6)列的回归中,资本密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生产函数的投入中资本产出弹性越高,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越低。企业进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及统计显著性并不稳健,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渠道的正负效应之和相互抵消,最终并未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但企业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通过

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创新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创造新产品的过程更偏向于劳动要素,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表2 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4)	(5)	(6)
企业市场份额	-0.130 6*** (-113.916)		-0.144 2*** (-121.239)	-0.144 1*** (-123.942)	-0.129 7*** (-106.882)	-0.129 8*** (-106.925)
行业销售额前1% 企业市场份额		-0.012 9*** (-5.264)	-0.122 0*** (-47.847)	-0.121 5*** (-48.667)	-0.108 7*** (-47.561)	-0.108 7*** (-47.571)
企业年龄				0.001 6*** (10.685)	0.001 1*** (7.863)	0.001 0*** (7.305)
资本密集度				-0.111 2*** (-101.302)	-0.110 6*** (-107.763)	-0.110 7*** (-107.885)
企业进口				-0.000 9*** (-3.446)	-0.000 0 (-0.076)	-0.000 0 (-0.063)
企业出口				0.002 9*** (14.428)	0.002 7*** (15.409)	0.002 7*** (15.314)
融资约束					-0.002 1*** (-3.194)	-0.002 1*** (-3.190)
利润率					-3.564 0*** (-63.532)	-3.562 7*** (-63.517)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					0.839 6*** (5.237)	0.805 0*** (5.019)
企业创新					0.001 3*** (5.020)	0.001 3*** (4.993)
国有资本比重						0.035 7*** (8.232)
外商资本比重						0.012 1** (2.527)
企业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adj. R <sup>2</sup>	0.644	0.631	0.646	0.655	0.719	0.719

注: 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  $t$  统计量, 基于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 (二) 内生性分析

一般情况下内生性的来源主要包括: 反向因果、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就本文而言, 第一, 企业销售份额主要是基于其生产率优势形成的, 而劳动收入份额是生产、销售完成后企业分配收益的环节, 因此其反向影响销售份额的能力较弱。第二, 变量的测量误差是内生性的来源之一。为避免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内生性分析中采用资产规模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3第(1)列。将该列回归结果与前文对比可以发现, 在考虑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后, 本文的基本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第三, 遗漏变量的问题也需要被重视。前文所有的分析中已经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但是为避免可能存在某些省份层面、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难以观测和控制, 从而导致估计有偏, 表3的第(2)列在保留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类似地, 表3第(3)列和第(4)列在表2第(6)列的基础上增加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及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也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 即企业相对规模以及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更进一步地, 为了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避免潜在的内生性, 本文还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3第(5)列和第(6)列。其中第(5)列使用企业销售份额与市场集中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第(6)列回归则构造了工具变量( $iv$ ),

具体来说,根据样本企业的经纬度位置  $Z_i(z_{1i}, z_{2i})$  以及企业所在城市中心的经纬度位置  $Z_j(z_{1j}, z_{2j})$  计算出企业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distance*),与城市一般预算支出(*exp*)相乘后取对数得到。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一方面规模越大的企业往往占地面积越大,为了节约用地成本越倾向于布局到城市外围,与城市中心距离较远,且城市一般预算支出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因此二者的交乘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企业与城市中心距离以及预算支出不会直接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满足外生性条件。第(5)列和第(6)列中关于工具变量的检验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弱识别原假设,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且得出的回归结果依然与前文一致。综上可知,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企业销售份额与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依旧会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3 内生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4)	(5)	(6)
企业销售份额		-0.192 6 *** ( -123.131)	-0.124 9 *** ( -104.073)	-0.193 9 *** ( -125.059)	-0.104 7 *** ( -49.268)	-0.665 0 *** ( -7.493)
行业集中度		-0.064 1 *** ( -25.377)	-0.105 3 *** ( -46.518)	-0.062 5 *** ( -24.716)	-0.151 5 *** ( -19.486)	-0.525 9 *** ( -7.628)
企业资产份额	-0.024 1 *** ( -22.163)					
行业资产集中度	-0.020 9 *** ( -9.89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FE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 FE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 FE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行业 FE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识别不足检验					6.5e+0.4 ***	120.957 ***
弱识别检验					2.4e+0.4 *** { 7.03}	85.245 *** { 16.38}
N	1 141 854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178	590 335	1 023 993
adj. R <sup>2</sup>	0.709	0.726	0.722	0.729	—	—

注: 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 *t*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花括号内数值为 Stock-Yogo 检验 10%的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 稳健性分析

1. 指标变换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这里使用生产法测度的劳动收入份额(*laborshare*)做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在表4第(1)列至第(4)列报告。关于市场集中度,本文使用行业内销售额前10%企业市场份额之和进行重新测度。回归结果在表4第(3)列至第(5)列中报告。由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企业市场份额越大,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市场集中度提升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并不因市场集中度和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表4 稳健性分析(一)

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生产法				收入法
	(1)	(2)	(3)	(4)	(5)
企业市场份额	-0.267 9 *** ( -266.320)	-0.265 0 *** ( -265.292)	-0.268 9 *** ( -267.124)	-0.265 9 *** ( -265.997)	-0.130 6 *** ( -190.079)
行业销售额前1%	-0.216 5 *** ( -82.586)	-0.213 8 *** ( -82.416)			
企业市场份额			-0.721 1 *** ( -85.068)	-0.709 6 *** ( -84.576)	-0.371 0 *** ( -64.335)
行业销售额前10%					
企业市场份额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adj. R <sup>2</sup>	0.660	0.668	0.660	0.668	0.719

注: 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 *t* 统计量,基于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 2. 其他稳健性分析的方法

第一,为了更好地捕捉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长期影响,本文参考戴觅等<sup>[33]</sup>的做法,在样本期内利用全样本首尾两年(1998年和2007年)构造了一个时间较长的差分,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表5第(1)列至第(3)列的长差分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市场集中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该结论与前文是一致的;第二,使用2011—2013年拓展样本。限于数据的可行性,本文的主要回归采用了1998—2007年样本,为考察新阶段中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本文首先参考李磊和徐大策<sup>[34]</sup>的方法,估算出2011—2013年企业的增加值,进而测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最后将测算的变量置于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5第(4)列和第(5)列所示,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即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所在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都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 五、扩展性分析

本部分将就以下两方面问题给出更细致的分析:第一,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的渠道是什么,即对假说1、假说2进行机制检验;第二,分析中国制造业中部分大企业的“大”是否与“差别化”政策有关,这些“差别化”政策又是否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即对假说3进行检验。

## (一) 影响渠道分析

前文的分析中,认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是由于较大的企业规模和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引起企业成本加成率提高导致的。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渠道的存在,首先,这里借鉴De Loecker and Warzynski<sup>[35]</sup>的方法,测度出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构造成本最小化问题,估算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后求解企业加成率;其次,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将成本加成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在表6中报告。

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企业规模与其加成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相对规模越大的企业可以将生产成本转化为更高的产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内生生产率提升带来了边际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可能来源于企业受到的外生政策影响,企业市场份额的提高使得企业拥有更高的市场势力,最终引起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高。此外,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会对企业的成本加成

表5 稳健性分析(二)

	1998—2007年长差分回归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2011—2013年新阶段样本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4)	(5)
企业市场份额变化	-0.1877*** (-20.016)		-0.2013*** (-21.694)		
市场集中度变化		-0.0260* (-1.802)	-0.1981*** (-7.440)		
企业市场份额				-0.0924*** (-34.520)	-0.1072*** (-26.373)
行业集中度				-0.0716*** (-12.731)	-0.0880*** (-11.1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行业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 FE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FE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 207	14 207	14 207	415 881	212 330
adj. R <sup>2</sup>	0.238	0.131	0.244	0.702	0.709

注: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 $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中的行业集中度用 $CR1per$ 表示。

表6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对加成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企业成本加成率	(1)	(2)	(3)
企业相对规模	0.2855*** (182.715)		0.3151*** (200.617)
行业市场集中度		0.0252*** (8.547)	0.2639*** (85.1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adj. R <sup>2</sup>	0.737	0.702	0.741

注: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 $t$ 统计量,基于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率起到正面促进作用,意味着在大企业集中、缺乏竞争的行业中,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程度低,可以凭借较高的产品价格获得垄断租金。二者的正向作用推动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高。成本加成率衡量了企业将成本转化为产品价格的能力,成本加成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则会越低。综上可知,企业规模与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会导致企业成本加成率提高,而成本加成率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因此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 (二) 对“差别化政策”的检验

按照理论分析,前文认为企业的市场势力形成包括两方面原因:一是内生实现规模经济带来的高生产率;二是企业可能得到的外生差别化政策产生的壁垒。无论是哪种原因促使企业拥有较高的市场势力,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面作用。本部分试图对这两类成因进行区分。这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依照前文的结论,似乎认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政策目标无法同时实现。但将市场势力的两类成因区分之后,可以针对具体成因进行分析,规模经济与高效率带来的大规模值得提倡,差别化政策等扭曲因素带来的市场势力以及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则是不合理的。

市场不存在扭曲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由其生产率决定,企业规模是生产率的函数、与之正相关并一一对应<sup>[24]</sup>。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应该具有较大的规模,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应该具有较小的规模。由于不易刻画现有大规模企业的应有规模,图4中我们采用间接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了实际规模在前1%的企业与应有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前1%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有情况。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中国实际的大规模企业与应有大规模企业并不对应,且实际大规模企业的市场份额在1998—2007年期间持续高于应有大规模企业的市场份额。这表明实际大规模企业的“大”中包含了生产率之外的其他成分。

当然通过典型事实分析的观察,还不足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因此,为检验是否由于外生“差别化”政策的存在导致了企业应有规模和实际规模出现偏差,并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作用,本文借鉴王永进等<sup>[25]</sup>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用企业绝对规模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然后将模型得到的残差项(*resid*)重新纳入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在表7中报告。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企业规模与生产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拟合程度较大,这初步

表7 对差别化政策的检验

	企业规模 (1)	劳动收入份额 (2)	企业规模 (3)	劳动收入份额 (4)
全要素生产率	0.6754*** (410.759)		0.6855*** (408.810)	
残差项		-0.1142*** (-56.078)		-0.1123*** (-41.764)
其他企业层面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1 156 840
adj. R <sup>2</sup>	0.934	0.633	0.935	0.710

注:括号内的值为系数的*t*统计量,基于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步印证了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残差项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负向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表7的第(2)列与第(4)列中,残差项中已不再包含规模经济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因素,因此可以认为残差项带来的市场势力提高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来自差别化政策的影响,换言之除去与生产率相匹配的规模因素之外,差别化政策的存在增强了企业的额外市场势力,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差别化”政策的来源可能包括补贴、地方保护主义和贷款优惠等。

在现实中,由于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合理的,可以称其为“合理的下降”;而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政策扶持补贴等“差别化”政策带来的额外市场势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不合理的,导致了“效率”和“公平”的双双损失,本文称其为“不合理的下降”。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国际一流大企业,不能依靠差别化政策的扶持,而要依靠生产率的提升,获得与其生产率相匹配的规模,实现资源更加优化合理的配置,形成持续增长和深层次的动力。

## 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

如引言所述,已有大量文献从多视角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诚然,这些因素都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来源,但其相对重要性和贡献度如何?对这一问题的明晰将有助于明确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来源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抓手。为此,本文使用 Shorrocks<sup>[36]</sup>提出的 Shapley 分解法来估算解释变量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度。

Shapley 方法的原理类似于合作博弈中的 Shapley 解,具体地:对于待测算贡献度的  $n$  个变量,每个变量可以被包含或不包含在方程中(共形成  $2^n$  个方程),通过逐步剔除每个变量,依次比较包含这个变量与不包含这个变量之间被解释变量的差距,对结果取平均值就会得到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的贡献度。尽管这一方法的计算量十分庞大,但其优点主要在于:第一,分解过程可以将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纳入,适合用于多变量贡献度的分解及比较;第二,分解结果不随变量的排序而发生变化,不依赖分解路径,从而不会因为变量的排序不同导致结果的差异。该方法在关于被解释变量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的研究中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up>[37-39]</sup>。有鉴于此,表 8 和表 9 报告了基于 Shapley 分解法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贡献度。

由于在企业层面的分析中样本量较大,加入企业虚拟变量后 Shapley 分解的计算量十分巨大,因此,表 8 中报告的结果是基于 OLS 回归得出的,暂未考虑企业固有特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由表 8 可知,利润率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解释度较高,这表明企业将收益转移至利润留存部分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其次,资本密集度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易于理解的,一般认为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会带来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资本密集度作为企业有偏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随着有偏技术进步的进一步深化,资本的更广泛使用会导致劳动使用数量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逐渐降低,要素之间的替代是要素收益变动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后,企业的相对规模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第三重要因素,市场集中度的贡献度排在第六位,因此在分析市场结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时,也十分有必要将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考虑在其中。

进一步地,为了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本文将企业层面的变量加权至行业层面,样本量降至 2 878 后再次进行 Shapley 分解。表 9 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解的结果,结果显示,除去行业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之外,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最主要受到行业的利润率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影响,这一结论与企业层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市场集中度的贡献度仅次于行业资本密集度与利润率水平,且明显大于其他因素。

基于以上企业、行业层面的分解结果表明,市场结构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与有偏技术进步。因此,通过加强竞争、培育和发展壮大中小企业,降低行业市场集中度会实现对市场结构的优化,进而将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水平。

表 8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贡献度

变量	贡献度	贡献度比重	排序
利润率	20.55%	50.41%	1
资本密集度	13.43%	32.94%	2
企业相对规模	3.87%	9.48%	3
企业出口	0.85%	2.09%	4
企业年龄	0.60%	1.47%	5
市场集中度	0.60%	1.46%	6
国有资本比重	0.47%	1.15%	7
资本劳动价格比	0.20%	0.49%	8
企业进口	0.15%	0.37%	9
外商资本比重	0.05%	0.14%	10
解释度	40.77%	100%	

表 9 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贡献度

变量	贡献度	贡献度比重	排序
行业虚拟变量	28.71%	45%	1
行业利润率水平	17.09%	26.79%	2
行业资本密集度	9.43%	14.79%	3
行业市场集中度	3.38%	5.30%	4
行业国有资本比重	1.26%	1.97%	5
行业出口	1.19%	1.87%	6
行业进口	0.96%	1.51%	7
行业创新	0.90%	1.41%	8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	0.75%	1.17%	9
行业外商资本比重	0.12%	0.19%	10
解释度	63.79%	100.00%	

##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结合现有国情深入挖掘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支持政策,促进企业形成深层次发展动力,减少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必要损失。

本文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企业规模和行业市场集中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规模扩大会通过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2)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竞争程度较低,劳动力议价能力较弱,导致企业获得较高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3)中国部分大企业的真实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与其对应的生产率水平,这可能是由于补贴、优惠贷款等差别化政策导致的,资源误置的同时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合理下降;(4)基于 Shapley 分解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市场集中度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与有偏技术进步,且明显高于其他因素。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通过促进优良营商环境的形成,加强市场竞争,注重大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培育,避免市场集中于头部企业,有利于优化行业的生态环境,也有利于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第二,在培养大企业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其生产效率的提升。对企业的支持政策不能仅停留在给予补贴、降低要素成本等方面,应加强对企业高知识密集度要素的培育和使用,促使企业形成持久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做大的同时更要做强。第三,应充分发挥工会等组织的职能,凝聚工人力量,提升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改善劳动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发展红利普惠民众,增进人民福祉。

### 注释:

- 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 ②该结论适用于任意形式的生产函数,证明如下:假设企业  $i$  的生产函数满足:  $Y_i = A_i f(L_i, K_i)$ 。其中,  $Y$  表示企业增加值,  $A$  为全要素生产率,  $L$  为劳动投入,  $K$  为资本投入。假设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劳动和资本的单位价格分别为  $w$  和  $r$ ,生产固定产量时,求解企业成本最小化的条件,即:  $\min F = wL_i + rK_i + \lambda_i [Y_0 - A_i f(L_i, K_i)]$ ,其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 F}{\partial L_i} = w - \lambda_i \frac{\partial Y_i}{\partial L_i} = 0 \Rightarrow \frac{wL_i}{Y_i} = \lambda_i \frac{\partial Y_i}{\partial L_i} \times \frac{L_i}{Y_i}$ ,令  $\mu_i = \frac{P_i}{\lambda_i}$  表示企业  $i$  的成本加成率,可得劳动收入份额  $LS_i \equiv \frac{wL_i}{P_i Y_i} = \frac{\lambda_i}{P_i} \times \frac{\partial Y_i}{\partial L_i} \times \frac{L_i}{Y_i} = \underbrace{\frac{1}{\mu_i}}_{\text{加成率倒数}} \times \underbrace{\frac{\partial Y_i}{\partial L_i} \times \frac{L_i}{Y_i}}_{\text{劳动产出弹性}}$ 。由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式可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由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劳动产出弹性决定。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即企业成本加成率为 1,因此完全竞争市场中劳动收入份额恒等于劳动产出弹性这一结论适用于任意形式的生产函数。
- ③李旭超等<sup>[24]</sup>推导出在最优配置条件下,  $size_{si}^e = A_{si}^{\sigma-1} H_s$ ,企业规模( $size$ )是生产率( $A$ )的指数函数,规模与生产率存在一一对应的单调关系。
- ④本文未使用 HHI 衡量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特征,是因为:第一,资源重置效应可能导致 HHI 的非单调性;第二,HHI 难以捕捉行业中的垄断程度<sup>[25]</sup>;第三,HHI 无法衡量行业中企业“大”的特征。

### 参考文献:

- [1]陈登科,陈诗一.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J]. 世界经济, 2018(12): 73-97.

- [2] 万江滔, 魏下海. 最低工资规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微观证据[J]. 财经研究, 2020(7): 64-78.
- [3] 钞小静, 廉园梅. 劳动收入份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 经济学动态, 2019(9): 66-81.
- [4] 白重恩, 钱震杰.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 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0(12): 3-27.
- [5] 罗长远, 张军.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4): 65-79+206.
- [6] 陈宇峰, 贵斌威, 陈启清. 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J]. 经济研究, 2013(6): 113-126.
- [7] 黄先海, 徐圣.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09(7): 34-44.
- [8] ACEMOGLU D. When does labor scarcity encourage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6): 1037-1078.
- [9] 余淼杰, 梁中华.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4(7): 22-31.
- [10] HARRISON A.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R].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2005.
- [11] 白重恩, 钱震杰, 武康平.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8): 16-28.
- [12] 申广军, 周广肃, 贾坤. 市场力量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和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18(4): 120-136+157.
- [13] BLANCHARD O, GIAVAZZI F.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3): 879-907.
- [14] BARKAI S. Declining labor and capital shar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20, 75(5): 2421-2463.
- [15] AUTOR D, DORN D, KATZ L F, et al.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2): 645-709.
- [16] 文雁兵, 陆雪琴.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J]. 经济研究, 2018(9): 83-98.
- [17] 贾坤, 申广军. 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6(5): 116-129.
- [18] CHENG H, LI H, ZHOU H W L A. Firm-size effect on wages: evidence from China's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R]. Working paper, 2019.
- [19] 刘啟仁, 黄建忠. 产品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J]. 世界经济, 2016(11): 28-53.
- [20] ROSENBERG J B. Research and market share: a reappraisal of the Schumpeter hypothesis [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76: 101-112.
- [21] 钱学锋, 范冬梅. 国际贸易与企业成本加成: 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研究, 2015(2): 172-185.
- [22] 苏治, 荆文君, 孙宝文. 分层式垄断竞争: 互联网行业市场结构特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8(4): 80-100+187-188.
- [23] 简泽, 黎德福, 沈筠彬, 等. 不完全竞争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一个融合产品—劳动力市场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 21-36.
- [24] 李旭超, 罗德明, 金祥荣. 资源错置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2): 25-43+205-206.
- [25] 王永进, 盛丹, 李坤望. 中国企业成长中的规模分布——基于大企业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3): 26-47+204-205.
- [26] 章韬, 孙楚仁. 贸易开放、生产率形态与企业规模[J]. 世界经济, 2012(8): 40-66.
- [27] SCHERER F M. Firm size, market structure, opportunity, and the output of patented inven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2): 20-24.
- [28] 盛斌, 毛其淋. 贸易自由化、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J]. 世界经济, 2015(2): 3-30.
- [29] 袁媛, 蔡建红.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前向生产链长度的测算[J]. 产业经济研究, 2019(5): 1-12+38.

- [30]徐保昌,李思慧,仇鑫. 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能否推动其成本加成提升? [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0(3): 1-10.
- [31]罗长远,陈琳.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 ——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3): 29-42.
- [32]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351.
- [33]戴觅,张轶凡,黄炜.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 [J]. 管理世界 2019(6): 56-69.
- [34]李磊,徐大策. 机器人能否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 ——机制与事实[J]. 产业经济研究 2020(3): 127-142.
- [35]DE LOECKER J, WARZYNSKI F. 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 2437-2471.
- [36]SHORROCKS F.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2 50(1): 193-211.
- [37]史新杰,卫龙宝,方师乐,等.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J]. 管理世界 2018(3): 27-37.
- [38]WAN G. 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2): 348-363.
- [39]聂海峰,岳希明. 行业垄断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程度的估计[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2): 5-20.

(责任编辑: 禾 日)

## Firm size ,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labor income share

SHENG Bin , HAO Bir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has shown a downward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based on Chinese NBS data ,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firm size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on firm's labor income shar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rm size and labor income share , which is caused by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rm size and markup ratio. Secondly , the higher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 the higher the markup ratio and the lower the firm's labor income share. Thirdly , by comparing the expected size and actual size of Chinese large firms ,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has caused the actual size of some firms to be larger than their expected size.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lso has caused unnecessary loss of labor income share. Finally , the Shapley decom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s of firm's relative size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to labor income share are only lower than the contributions of profit ratio and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 also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other factors. The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will also help provide policy inspiration for upgrading labor income share.

**Key words:** firm size; market concentration; labor income share; markup;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Shapley decomposition